

2017 年度 公益財団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協会 フェローシップ事業成果報告書

## 1917 年《臺灣新聞》之改組與松岡富雄

東海大学 歴史学系

蔡秀美

招聘期間（2018 年 1 月 18 日～3 月 5 日）

2018 年

公益財団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協会

## 1917 年《臺灣新聞》之改組與松岡富雄

蔡秀美(東海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 一、前言

《臺灣新聞》社係日治時期臺灣中部地區最具代表性的報社，與臺北的《臺灣日日新報》、臺南的《臺南新報》並稱為日治時期臺灣三大報。《臺灣新聞》的前身，最早可溯及 1901 年 5 月創刊的《臺中每日新聞》，爾後，歷經幾次改組，1903 年改名為《中部臺灣日報》，1907 年正式定名為《臺灣新聞》。<sup>1</sup>迨至 1944 年，臺灣總督府為加強言論統制，《臺灣新聞》遂與臺灣島內其他五報合併成《臺灣新報》。自 1907 年定名以迄 1944 年被合併，《臺灣新聞》可說稱霸臺灣中部報界達 37 年。長期以來，該報每日發行量約八千份。<sup>2</sup>其報社輿論反映臺灣中部輿情，堪稱是引領臺灣中部輿論方向之指標，自不待言。

就《臺灣新聞》歷任社長觀之，以第二任社長松岡富雄任期最久。首任社長山移定政，1917 年辭職，任期 10 年。第二任社長由臺中實業家松岡富雄繼任，直至 1944 年，其任期高達 27 年，可說是長期左右《臺灣新聞》社營運方向的重要人物。上述兩位社長均來自熊本縣，惟經營報社的作風迥然有別，尤其是 1917 年山移定政社長辭職之際，其所屬的原《臺灣新聞》社主筆、重要編輯幹部亦一併隨之辭職，松岡富雄社長接任社長後，乃起用新人接任，改組報社人事結構；同時，對外招募投資股東，擴大報社規模。顯然地，1917 年可說是《臺灣新聞》社經營與人事變動最激烈的轉捩點。

職是之故，本文旨在探討 1917 年松岡富雄入主《臺灣新聞》社之經緯及其影響，剖析 1917 年前後《臺灣新聞》言論特色之轉變，俾便釐清「政商」松岡富雄在臺灣中部新聞界所扮演之角色。

### 二、日治初期《臺灣新聞》社之創刊與發展

1898 年以降，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與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上任後，為了推動新聞統制，加強台灣北、中、南部三地重要報社人事之統制，致力於延攬曾有公

<sup>1</sup> 國勢新聞社編，〈臺灣新聞社〉，《臺灣新聞總覽》昭和 11 年 7 月號，1936 年 7 月，頁 9。

<sup>2</sup> 葉華女士，〈臺灣記者亡國恨(上)〉，《申報》，1931 年 12 月 1 日，11 版。

職經歷的退職官員，或與總督府官員關係密切的言論界名士，擔任報社的幹部或編輯群。首先，1898年將《臺灣新報》與《臺灣日報》合併成立《臺灣日日新報》，社長守屋善兵衛，係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任職於內務省時期的德文翻譯，曾經營「衛生新聞」之報紙；副社長村田誠治為日本國內新聞界的耆老，曾編纂神戶開港史；主事木大東為總督府退職官員等均是。《臺南新報》於1900年2月在臺南創刊，社長富地近思時任臺南縣學務課長，主筆寺田望南則於日治初期以通譯官身分來臺任職。至於《臺中每日新聞》，則於1901年在臺中創刊，社長由《臺灣日日新報》社長守屋善兵衛兼任，主筆亦延攬《臺灣日日新報》的泰斗奧山十平（勿來）擔任。因此，日治時期《臺灣日日新報》漢文欄主筆尾崎秀真回顧臺灣新聞發展史時，乃將《臺中每日新聞》與《臺南新報》視為《臺灣日日新報》的姐妹報，稱之為「官僚系的新聞」（具有官方色彩的報紙），並將上述三報社先後鼎足而立，稱為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時代推動新聞統制措施的初步成果。

3

由上可知，作為《臺灣新聞》之前身的《臺中每日新聞》創刊之初，其人事結構即深具官方色彩。1903年3月，《臺中每日新聞》改名為《中部臺灣日報》，1907年10月正式定名為《臺灣新聞》，<sup>4</sup>報社的支配人為到津忠次郎，<sup>5</sup>社長由臺中執業律師山移定政兼任，主筆仍沿用奧山十平擔任，另有高島利三郎、武田暨楠等幹部。<sup>6</sup>

山移定政，係熊本縣的藩士，1866年生，<sup>7</sup>1895年5月奉命從遼東的戰場上以通譯官來臺。<sup>8</sup>其後，辭卸公職，在臺中執業律師，兼任台灣新聞社長。其任職社長期間，頗為照顧下屬，隱然成為臺中一大勢力，<sup>9</sup>報社編輯群、職員大多數為熊本縣人，<sup>10</sup>例如，主筆奧山十平離職後，延聘中村事擔任主筆。中村事，即熊本縣人，其後擔任《台灣新聞》社編輯長，以「拔天樓」之名而聞名。<sup>11</sup>平心而論，即使山移未必刻意援引同鄉人事入社，但是其下屬事務員招攬事務員，記者招引記者，其結果，《臺灣新聞》讓外界產生「熊本新聞」之觀感遂油然而生。<sup>12</sup>

1910年《臺灣新聞》開始設立台北支局，派幹部記者常駐台北，先派主筆

<sup>3</sup> 尾崎秀真，〈臺灣新聞界の回顧〉，《臺灣時報》昭和14年2月號，1939年2月，頁69-70。

<sup>4</sup> 國勢新聞社編，〈臺灣新聞社〉，《臺灣新聞總覽》昭和11年7月號，1936年7月，頁9。

<sup>5</sup> 〈到津忠次郎〉，《臺灣日日新報》4353號，1912年7月13日，2版。

<sup>6</sup> 〈記者大會詳報〉，《漢文臺灣日日新報》3147號，1908年10月25日，5版。

<sup>7</sup> 〈三新聞の中心人物〉，《新臺灣》大正4年11月號，1915年11月，頁79。

<sup>8</sup> 山移定政，〈忘れぬ實歴〉，《臺灣日日新報》6413號，1918年5月1日，36版。

<sup>9</sup> 〈三新聞の中心人物〉，《新臺灣》大正4年11月號，1915年11月，頁79。

<sup>10</sup> 時雨郎，〈國と人（一四）熊本縣（一）〉，《新臺灣》5號（總號45），1919年5月，頁14。

<sup>11</sup> 〈三新聞の中心人物〉，《新臺灣》大正4年11月號，1915年11月，頁80。

<sup>12</sup> 時雨郎，〈國と人（一四）熊本縣（一）〉，《新臺灣》5號（總號45），1919年5月，頁15。

梶原保人為先鋒，並調派山下、內田兩記者至臺北支局服務，<sup>13</sup>開始將新聞視角擴展至北部。

要之，日治初期臺灣新聞社較引人關注的，在於其編輯人事幾乎以熊本縣人出身者為主，至於報社的經營實況，則在台灣三大報社中，似乎表現平平。時論將此一結果歸咎於山移社長「一面從事繁忙的律師事務，一面擔任《台灣新聞》社社長，無法全神貫注於該報社欠佳的財政經營與新聞編輯等，事與願違，無法盡情發揮本領，遂將社長的重任讓給松岡富雄」。<sup>14</sup>

### 三、1917 年松岡富雄與《臺灣新聞》社之改革

松岡富雄與山移定政相同，均係熊本縣人。松岡生於 1870 年，先後肄業東京駒場農科大學別科、北海道札幌農學校豫科。其於 1903 年來臺，來臺前歷任熊本縣肥南坑木合資會社取締役、溫泉改良株式會社取締役、熊本縣機械製絲業者組成的「肥後生糸共同組」組合長，1896~1899 年起連任熊本縣縣會議員；1903 年來臺擔任臨時臺灣糖務局囑託，1906 年離職後租借糖務局所屬的臺中甘蔗苗圃，從事蔗苗之育種工作。<sup>15</sup>翌年創立松岡製糖所。1910 年與松方正熊、山下秀實等人共同發起創立帝國製糖株式會社，並擔任該會社專務取締役（專務董事）。1913 年卸任專務取締役一職後，轉而前往桃園、新竹兩廳從事蔗苗培育工作，之後，到臺中廳鹿港從事開墾事業。<sup>16</sup>1915 年在臺中創立松岡拓殖合資會社，<sup>17</sup>1917 年 4 月擔任臺灣新聞社取締役社長，同年 6 月，在菲律賓創立「比律賓拓殖合資會社」、「松岡興業會社」，經營麻、椰子等農產品之販賣、土地開墾等之事業。<sup>18</sup>1919 年擔任臺、日人合資的臺灣製麻株式會社取締役、臺灣製紙株式會社取締役、臺灣製粉株式會社取締役，<sup>19</sup>並創立新竹製糖株式會社，擔任專務取締役。同時，大日本農會鑑於松岡對臺灣農業的貢獻，特頒發「綠白綬有功章」加以表揚。<sup>20</sup>1920 年獲選任臺中州協議會員。翌（1921）年進而獲選

<sup>13</sup> 〈無絃琴〉，《臺灣日日新報》3774 號，1910 年 11 月 21 日，2 版。

<sup>14</sup> 城南樵夫，〈臺灣操觚界の過去十年〉，《臺灣警察協會雜誌》108 號，1926 年 6 月，頁 257。

<sup>15</sup> 〈昭和九年七月煙草賣捌人暨匿名組合員履歷書 松岡富雄〉，《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檔案》，3307 冊（新 3459 冊）67 件。

<sup>16</sup> 太田肥州，《新臺灣を支配する人物と産業史》（臺北：臺灣評論社，1940 年），頁 344；大園市藏，《現代臺灣史》（臺北：日本殖民地批判社，1933 年），頁 106。

<sup>17</sup> 上村健堂編，《臺灣事業界と中心人物》（臺北：臺灣案內社，1919 年），頁 225。

<sup>18</sup> 〈昭和九年七月煙草賣捌人暨匿名組合員履歷書 松岡富雄〉，《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檔案》，3307 冊（新 3459 冊）67 件；上村健堂編，《臺灣事業界と中心人物》（臺北：臺灣案內社，1919 年），頁 225。

<sup>19</sup> 興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該社，1943 年），頁 369。

<sup>20</sup> 〈昭和九年七月煙草賣捌人暨匿名組合員履歷書 松岡富雄〉，《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檔案》，3307 冊（新 3459 冊）67 件；大園市藏，《臺灣の中心人物》（臺北：日本殖民地批判社，1921），頁 106。

任為第一屆臺灣總督府評議員。<sup>21</sup>要之，松岡經營的事業頗為多元，橫跨糖業、蔗苗培育、製麻、製粉、製紙、菲律賓拓殖事業，以及報業「臺灣新聞社」，時人稱譽其為「天才的事業家」，<sup>22</sup>可說是日治時期重要的日人政商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松岡的事業，有的明顯地係配合殖民政府當局施政的先鋒事業，有的是與臺灣民眾生活息息相關的民生企業，有的則是介於政府與民間的公共事業。無怪乎，時人評價指出：「其所從事的企業都充滿國家觀念，對於個人事業的成敗則無所謂，堪稱為『國士』。」<sup>23</sup>甚至明白指稱其為「中部臺灣政商第一人」。<sup>24</sup>就松岡富雄一生所從事的事業觀之，製糖業可說是其來臺後開始發跡的事業，然而，自 1920 年代以降，其在製糖業的角色逐漸退居二線，不再擔任實際經營者，而漸次將其事業重心置於新聞業。<sup>25</sup>

1917 年，松岡富雄正式入主《臺灣新聞》。該年 3 月，原社長山移定政、支配人到津忠次郎均辭職退社；4 月，松岡富雄、船津定一分別接任社長、支配人。<sup>26</sup>其中，新任支配人船津定一，曾任職帝國製糖會社，後轉入中壢輕鐵，<sup>27</sup>與松岡的關係尚稱密切。原編輯長中村事曾一度留任，<sup>28</sup>然而，迨至 5 月，編輯長中村事與宮田臺北支局主任、高平社會部主任均連袂辭職。<sup>29</sup>關於上述幹部辭職後之動向，據傳，原支配人到津忠次郎進入臺中持木商會、中村事任職於台灣銀行調查課，宮田將過田園生活，高平將從事某事業。<sup>30</sup>由上顯示，1917 年松岡富雄擔任《臺灣新聞》社長一事，似乎引發報社內部人事的強烈反彈，以致不少前任社長山移定政時期的幹部紛紛辭職他就。

松岡繼任為社長後，一掃前任山移定政社長的作風，大刀闊斧地改革新聞社的人事及報社經營。其中，關於人事方面，松岡富雄先於 1917 年 3 月，延攬原《臺灣日日新報》記者大野恭平擔任主筆；<sup>31</sup>同年 5 月，再從《臺灣日日新報》延攬記者宮川次郎轉任《臺灣新聞》臺北支局服務。<sup>32</sup>

1917 年 5 月 29 日，《台灣新聞》社正式召開股東總會，一方面報告財政收

<sup>21</sup> 興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該社，1943 年），頁 369。

<sup>22</sup> 吉田靜堂，《續財界人の横顔》（臺北：經濟春秋社，1933 年），頁 18。

<sup>23</sup> 吉田靜堂，《續財界人の横顔》，頁 18。

<sup>24</sup> 椿本義一，《臺灣大觀》（東京：大阪屋號，1923 年），頁 42。

<sup>25</sup> 泉風浪，《中部臺灣を語る》（臺中：南瀛新報社出版部，1930 年），頁 157。

<sup>26</sup> 〈昭和九年七月煙草賣捌人暨匿名組合員履歷書 松岡富雄〉，《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檔案》；上村健堂編，《臺灣事業界と中心人物》（臺北：臺灣案内社，1919 年），頁 225。

<sup>27</sup> 〈臺灣新聞大更迭〉，《臺灣日日新報》6006 號，1917 年 3 月 20 日，2 版。

<sup>28</sup> 〈臺灣新聞大更迭〉，《臺灣日日新報》6006 號，1917 年 3 月 20 日，2 版。

<sup>29</sup> 〈地方近事：臺灣新聞社員の退社〉，《臺灣日日新報》6055 號，1917 年 5 月 8 日，3 版。〈地方近事：中村氏の送別會〉，《臺灣日日新報》6069 號，1917 年 5 月 22 日，3 版。

<sup>30</sup> 〈地方近事：臺灣新聞社員の退社〉，《臺灣日日新報》6055 號，1917 年 5 月 8 日，3 版。〈地方近事：中村氏の送別會〉，《臺灣日日新報》6069 號，1917 年 5 月 22 日，3 版。

<sup>31</sup> 〈臺灣新聞大更迭〉，《臺灣日日新報》6006 號，1917 年 3 月 20 日，2 版。

<sup>32</sup> 〈宮川次郎氏（本社記者）〉，《臺灣日日新報》6060 號，1917 年 5 月 13 日，2 版。

支，一方面決議將資本額 2 萬圓增資為 10 萬圓，<sup>33</sup>同時舉辦股東會董事、監事改選會議，選舉結果，選任松岡富雄、安土直次郎、池田競、船津貞一計 4 人擔任董事，坂本素魯哉則當選監事。股東會結束後，當日夜晚 7 時。松岡富雄假臺中座舉辦就任宴會，宴請台中重要官民三百人，並在席間一一介紹船津支配人、大野主筆、宮川台北支局主任等新任幹部。<sup>34</sup>要言之，松岡富雄掌舵下的《臺灣新聞》社可說經歷一番換血，汰舊換新，似乎有意展現新的報社氣象。

松岡富雄接掌《台灣新聞社》社長，旋即致力於擴展該社營運，其具體作法有三：其一，努力更新設備，例如，1918 年 8 月增建兩層磚瓦砌成的新聞工場，並設置輪轉機；10 月將該社報紙的版面從 6 頁擴增為 8 頁。<sup>35</sup>1919 年 7 月，新建台灣新聞社第二工場，配置輪轉機。<sup>36</sup>其二，積極向中部各地方當局爭取轉載公報之機會，例如其上任後，獲得臺中、新竹兩州廳和兩市役所之許可，轉載州報、市報，作為報紙附錄。<sup>37</sup>其三，計畫刷新版面，配合當局向南洋發展等。<sup>38</sup>

上述改革之結果，不僅使該報發行量漸次增加，且新任主筆大野恭平的努力亦獲得時論正面的評價，1920 年時論回顧該報社沿革時指出，該報在前任社長山移定政任內，諸事皆不順，此次「因新社長、新主筆、新支配人，乃有今日之博聲名」，近來該報發行部數成長近七千部，乃係大野主筆上任後漸次增加的結果，並稱讚大野恭平的筆鋒「目悠然暢氣」，連《臺灣日日新報》的編輯記者「亦有謂中報可相匹敵」。<sup>39</sup>

儘管如此，《臺灣新聞》仍面臨不少隱憂，首先，關於人事，如前所述，主筆大野恭平與臺北支局長宮川花人兩人，均是從《臺灣日日新報》社延攬而來，兩人在報社可說是「松岡的雙璧」，易言之，一在本社，一在臺北支局，相互呼應。<sup>40</sup>不過，其後，隨著兩人勢力日漸擴大，遂產生黨同伐異之弊，不知不覺地構成大野黨、宮川黨兩派。<sup>41</sup>

為了改善上述黨派之爭，松岡富雄先與主筆大野恭平協調，決議實施內部改組，從東京新聘宮島真之作為新血，擔任副社長。宮島真之（原名菊井真之，1868-1925），熊本縣人，幼年曾入學德富蘇峰創辦的「大江義塾，與松岡富雄

<sup>33</sup> 〈臺灣新聞增資〉，《臺灣日日新報》6069 號，1917 年 5 月 22 日，4 版。

<sup>34</sup> 〈地方近事：松岡社長の披露宴〉、〈地方近事：山移氏に紀念品〉，《臺灣日日新報》6079 號，1917 年 6 月 1 日，3 版。

<sup>35</sup> 國勢新聞社編，〈臺灣新聞社〉，《臺灣新聞總覽》昭和 11 年 7 月號，1936 年 7 月，頁 9。

<sup>36</sup> 〈地方近事：新聞社の増築〉，《臺灣日日新報》6868 號，1919 年 7 月 30 日，4 版。

<sup>37</sup> 國勢新聞社編，〈臺灣新聞社〉，《臺灣新聞總覽》昭和 11 年 7 月號，1936 年 7 月，頁 10。

<sup>38</sup> 〈臺灣新聞大更迭〉，《臺灣日日新報》6006 號，1917 年 3 月 20 日，2 版。

<sup>39</sup> 〈臺灣之新聞界〉，《實業之臺灣》12 卷 10 號，1920 年 10 日，頁 68。

<sup>40</sup> 吉川生，〈臺灣改革の第一步：俎上の臺灣三新聞（一）〉，《實業之臺灣》12 卷 12 號，1920 年 12 月，頁 19。

<sup>41</sup> 吉川生，〈臺灣改革の第一步：俎上の臺灣三新聞（一）〉，《實業之臺灣》12 卷 12 號，1920 年 12 月，頁 19。

相同，均於 1884 年 10 月成為「大江義塾」塾生。1904 年宮島成為福岡日日新報記者，<sup>42</sup>之後，據守熊本鄉先輩蘇峰逸人（德富蘇峰）的論壇中心，展現大海狂瀾的猛烈聲勢，旋即被引介進入德富蘇峰主持的《國民新聞》，以典雅古風之筆調，長年效忠於德富蘇峰，可說「自始至終完全是元老級的新聞記者」。<sup>43</sup>由上觀之，為了平衡社內人事之紛爭，松岡富雄利用其同鄉、同學的人際網絡，特地延聘在日本國內頗具聲望的宮島真之，坐鎮《臺灣新聞》。另有傳言亦指出，此次關於宮島的人事安排，乃是 1917 年松岡社長上任之際，透過其恩師德富蘇峰，與宮島達成的一種默契。<sup>44</sup>

1920 年為了延攬宮島真之，松岡富雄親赴東京，最後與宮島達成協議，同意將報社所有實權交給宮島為條件，宮島乃於同年辭卸《國民新聞》編輯長的高位前來台灣。《臺灣新聞》社員獲知上述消息後，內部改革的砲火因而引燃，引起騷動，但眾人仍決定待松岡社長返回報社後再決定行動。結果，當松岡社長因故而搭晚一班的船回台之際，臺北支局長宮川花人竟到基隆迎接他，搶先商量改革之事，宮川向松岡說明若大野恭平離職，而自己也隨之離職的話，對社務恐怕有所不利，松岡明瞭上述原委後，要求宮川繼續留任。其後，松岡富雄、宮島真之，以及宮川花人等報社幹部在臺中密商社內的改革方向，新的報社編制於焉成立，亦即，在松岡社長的領導下，由宮島真之擔任副社長兼主筆，宮川花人擔任編輯長。<sup>45</sup>上述人事改組之結果，前主筆大野恭平可說成為此一鬥爭中被犧牲的對象。據聞，前主筆大野恭平決定辭職前夕，曾特地拜見民政長官下村宏，向其致敬並辭行，下村長官向大野透露：「你的退社是意外，為了改革別無選擇」之意味的言詞。總而言之，此次台灣新聞改革之際，出現各種暗鬪曲折，乃是事實。<sup>46</sup>上述傳言，似乎反映此次《臺灣新聞》之人事改革，總督府當局亦有所聞。

上述人事鬥爭的結果，無疑埋下《臺灣新聞》人事繼續紛擾不安的種子。宮川花人從臺北支局長升任編輯長之後，其所留下的職缺成為報社內部各方人馬競逐的焦點，無論是台北支局、台南支局或本報的記者中，均出現運作者。然而，在各界運作下，此一懸缺仍決定暫時由編輯長宮川花人兼任。此一人事安排，導致報社內部的反宮川黨因而認定此乃宮川為了維持勢力的策略，而感到十分不平。就這樣，《台灣新聞》的實權落入編輯長宮川花人的手中。至於副社長宮島真之，

<sup>42</sup> 花立三郎，《德富蘇峰と大江義塾》（東京：ペリかん社，1982 年），頁 241、296。

<sup>43</sup> 江水生，〈臺灣論壇總まくり〉，《新臺灣》大正 10 年 3 月號，1921 年 3 月，頁 14。

<sup>44</sup> 花立三郎，《德富蘇峰と大江義塾》（東京：ペリかん社，1982 年），頁 241；吉川生，〈臺灣改革の第一步：組上の臺灣三新聞（一）〉，《實業之臺灣》12 卷 12 號，1920 年 12 月，頁 19-20。

<sup>45</sup> 吉川生，〈臺灣改革の第一步：組上の臺灣三新聞（一）〉，《實業之臺灣》12 卷 12 號，1920 年 12 月，頁 20。〈宮島真之書簡（蘇峰宛て）〉，大正 9 年 8 月 27 日，未刊稿，德富蘇峰記念館典藏。

<sup>46</sup> 吉川生，〈臺灣改革の第一步：組上の臺灣三新聞（一）〉，《實業之臺灣》12 卷 12 號，1920 年 12 月，頁 20-21。

因其尚未充分瞭解情況臺灣的情況，加上其為人係溫厚篤學的紳士，與編輯長宮川花人進行角力時並非配合扮演出醜的角色，因此，該報如何活躍發展，幾乎落在編輯長宮川花人的肩上。於是，反宮川黨的在報社內操縱，導致該報的新聞編輯風格不得不受到中挫。<sup>47</sup>總之，《臺灣新聞》歷經此次改革，並未因而呈現社內全員團結一致的情況，反而漸趨分裂。

無怪乎，1921年，時論品評臺灣新聞界，將臺灣北部《臺灣日日新報》社長赤石定藏、中部《臺灣新聞》副社長兼主筆宮島真之、南部《臺南新報》主筆西崎巒州（西崎順太郎）並稱為臺灣新聞界的三大記者；<sup>48</sup>同時，慨嘆《臺灣新聞》報社內未有與宮島匹敵、相輔相成的人才，令人感嘆。<sup>49</sup>

其次，第二大隱憂在於報社資本，該報社自前社長山移定政時期，該報社資本已出現虧本情況。松岡上任後，曾遣主筆大野恭平赴日本國內銷售股份。<sup>50</sup>1920年，時論曾分析臺灣三大報社之經營成果，表示三大報社中，《臺灣日日新報》之經營最容易，其次為《台南新報》，而《臺灣新聞》「今在苦鬪中。內地廣告。於份量少有登載。比諸南報廉價。令人不堪其同情。」<sup>51</sup>顯然地，松岡富雄擔任《臺灣新聞》社長三年間，該報的營利成長似乎有限。

1917年，松岡富雄上任之際，曾以船津定一為報社支配人，但1919年台灣新聞社的支配人再度更迭，同年11月，原支配人船津貞一辭職，由曾任安平稅關支署長的竹內壽衛馬擔任。<sup>52</sup>1924年，竹內壽衛馬又辭職，由坂本登入社擔任支配人。<sup>53</sup>坂本登，乃台中第一大日人資產家坂本素魯哉的外甥，坂本素魯哉時任彰化銀行專務，是《臺灣新聞》社的大債權人。曾有人評道：松岡之所以將坂本登引進報社，乃是為了討好坂本素魯哉的結果，堪稱是「松岡一流的高等策略」。<sup>54</sup>要之，上述報社支配人不斷更替，反映報社財務欠缺穩定，以致支配人不堪虧損，接連辭職。

事實上，松岡擔任《台灣新聞》社長時的經營實況，亦可從同時期主筆宮島真之寄給德富蘇峰的信函略窺一二，據1922年8月宮島真之致德富蘇峰的函件內容，略謂：「目前財界景氣蕭條仍接踵而來，松岡亦面臨九死一生之處境，新聞社將被某資本家掠奪，望您明瞭其惡戰苦鬪之內情。」<sup>55</sup>宮島的証言若為是，

<sup>47</sup>吉川生，〈臺灣改革的第一步：祖上の臺灣三新聞（一）〉，《實業之臺灣》12卷12號，1920年12月，頁20-21。

<sup>48</sup>江水生，〈臺灣論壇總まくり〉，《新臺灣》大正10年3月號，1921年3日，頁14-15。

<sup>49</sup>江水生，〈臺灣論壇總まくり〉，《新臺灣》大正10年3月號，1921年3日，頁16。

<sup>50</sup>〈臺灣之新聞界〉，《實業之臺灣》12卷10號，1920年10日，頁68。

<sup>51</sup>〈臺灣之新聞界〉，《實業之臺灣》12卷10號，1920年10日，頁68。

<sup>52</sup>〈地方近事：支配人の更迭〉，《臺灣日日新報》6973號，1919年11月12日，4版。

<sup>53</sup>國勢新聞社編，〈臺灣新聞社〉，《臺灣新聞總覽》昭和11年7月號，1936年7月，頁10。

<sup>54</sup>宮川次郎，《臺灣放言》（東京：蓬萊書院，1934年），頁150。

<sup>55</sup>〈宮島真之書簡（蘇峰宛て）〉，大正11年8月24日，未刊稿，德富蘇峰紀念館典藏。



則《台灣新聞》的財政自 1920 年代初期可能已面臨虧損，無怪乎 1924 年松岡不得不引進坂本的勢力，協助報社紓解財務困難。

1924 年支配人坂本登入社後，開始輔佐社長松岡富雄，從事社內改革。1925 年 5 月開始發行夕刊。1927 年 5 月 15 日起每週一發行附錄新竹版，1928 年 2 月 6 日每週一、四兩日的日刊 6 頁，1930 年版面增至 8 頁，1931 年 4 月起每週二發行附錄高雄版。1933 年 12 月配合彰化市制之實施，增刊彰化市報為附錄，於周日發行夕刊。<sup>56</sup>顯然的，1924 年以降，將資本勢力引進報社，有助於報社業務之拓展。

### 三、代結論——松岡入主《台灣新聞》社之影響

綜上所述，日治之初，作為中部台灣第一大報的《臺灣新聞》及其前身報紙，因其報社編輯記者長期以熊本縣出身者為主，其言論特色亦幾乎偏向中部地區。

1917 年松岡之所以擔任《台灣新聞》社長，其原因或許是同為熊本縣出身者的鄉緣人際網絡。不過，松岡上任後，即全面肅清向來的報社幹部，採用大野、宮川等非熊本縣人的才俊擔任報社要職，改變外界將《台灣新聞》視為「熊本新聞」的觀感。<sup>57</sup>雖然 1920 年松岡仍不得不啟用同為熊本縣人的宮島真之擔任主筆，但連續幾次人事改組的結果，雖讓《台灣新聞》的熊本色彩減弱不少，但已讓《台灣新聞》的新聞編輯風骨折損不少。松岡為了推動《台灣新聞》之發展，自 1920 年代起，開始引進資本家進入報社，讓資本家掌握報社資源，其結果，自然而然使《台灣新聞》每況愈下。

就松岡富雄個人的成敗觀之，正因松岡長年擔任《臺灣新聞》社長，因此，其於 1920 年獲選任為臺中州協議會員後，翌（1921）年即獲選任第一屆臺灣總督府評議員，<sup>58</sup>當時，與松岡富雄同樣的以報社社長之姿擔任總督府評議員者為臺灣日日新報社長赤石定藏、臺南新報社長富地近思，其他日人總督府評議員尚有臺灣銀行頭取中川小石郎、臺灣拓殖製茶常務取締役平山午介、彰化銀行支配人坂本素魯哉、高工銀行頭取古賀三千人。上述七人同時被選任為總督府評議員，其後一再連任。<sup>59</sup>顯然的，擔任報社社長一職，可說有助於松岡在台灣中部地區的實業界和輿論界建立舉足輕重的地位。由於松岡在實業界的表現深獲地方政府、臺灣總督府之肯定和表現，時人乃將其與臺中的大富豪、彰化銀行經營者坂本素

<sup>56</sup>國勢新聞社編，〈臺灣新聞社〉，《臺灣新聞總覽》昭和 11 年 7 月號，1936 年 7 月，頁 10-11。

<sup>57</sup>時雨郎，〈國之人（一四）熊本縣（一）〉，《新臺灣》5 號（總號 45），1919 年 5 月，頁 15。

<sup>58</sup>興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該社，1943 年），頁 369。

<sup>59</sup>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與義務教育之實施——以 1921-1922 第一屆臺灣總督府評議員之議論為中心〉，《臺灣師大歷史學報》48 期，2012 年 12 月，頁 238-240。

魯哉並列為「中部臺灣的功勞者」。<sup>60</sup>

1920年起，時論開始猛烈批評松岡經營《臺灣新聞》之不當措施，略謂：「若讓我們直言不諱地說，我們希望松岡社長仍然作為一位事業家，他並不太適任報社經營者。該報的第一次改革，亦即從社長山移定政之手移交給松岡之際，甚至有人說這是松岡為了營利或是為了利用新聞的威力為自己辯護所致。無論如何，我們列舉松岡作為直接責任者的事蹟，就可相信松岡向來的行事作為並不完全是上策。據某消息通表示，松岡若不是擔任社長，將不會像今日這樣受到總督府或臺灣銀行注意，事業亦可順利地發展。」<sup>61</sup>上述評論明白批評松岡經營報社的心態，十分可議，暗指松岡似有將報紙作為私人工具之嫌。

1929年，時人直指《臺灣新聞》乃松岡富雄個人色彩強烈的報紙，甚至直稱《臺灣新聞》為「松岡的新聞」，並表示：「松岡社長過去是位事業家，大概具有政商型傾向。換言之，所謂政商型，就是使作為新聞人的主筆不得不從事社會性地自殺」。<sup>62</sup>言下之意，暗指松岡的個人意志和決策，扼殺了報社新聞人的風骨。

總而言之，1917年松岡富雄之入主《台灣新聞》社，雖有助於《台灣新聞》打破過去長年以熊本縣出身者為主的人事結構，但其人事結構和財務困難，反而讓《臺灣新聞》逐漸受到資本家的掌控。

日治時期台灣三大報社中，《臺灣新聞》似乎給予外界經常內鬨之觀感。<sup>63</sup>本研究結果指出，日治時期《臺灣新聞》社之人事改組，不僅是臺灣中部地區在臺日人各派勢力競逐之結果，同時也反映日治中期資本家企圖影響，甚至掌握媒體公器之實況。

---

<sup>60</sup> 泉風浪，《礎石は輝く》（臺北：南瀛新報社，1934年），頁105。

<sup>61</sup> 吉川生，〈臺灣改革の第一步：姐上の臺灣三新聞（一）〉，《實業之臺灣》12卷12號，1920年12月，頁19。

<sup>62</sup> 〈新聞論評：臺灣新聞〉，《臺灣實業界》第1年第8號，1929年11月，頁11、16。

<sup>63</sup> 宮川次郎，《臺灣放言》（東京：蓬萊書院，1934年），頁150。